

论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历史叙事

翟传鹏^{1,2}

(1. 西安邮电大学 数字艺术学院, 西安 710121; 2.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黄金时代》始终以一种审美性的眼光来结构历史,以诗意的语言来描绘“文革”记忆,使历史记忆多了一份诗意与美感,少了一份壮烈与凄惨。作者对于“文革”记忆有着复杂的态度,于批判中杂糅着理想主义因子。《黄金时代》典型地实践了“陌生化”手法,以儿童视角来结构历史,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趣味性。

关键词:王小波;《黄金时代》;历史叙事;陌生化

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3)03-0062-05

“时代三部曲”中的《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成熟之作,是与作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和经验联系最为密切的一批作品。《黄金时代》不同于《白银时代》中恣意汪洋的乌托邦构想和充满反神话意味的写作,亦不同于《青铜时代》中充满轻逸新奇的历史场景想像,更不同于《黑铁时代》中那种福柯意义上的监狱场景,《黄金时代》更加坚实地依靠着现实的大地,更加坚实地依靠着个人和种群的群体记忆,更加坚实地依靠着刚刚逝去的那份情愫。因此,《黄金时代》虽不像王小波其他作品那样工于叙事的雕琢,然其所要表达的感情却更为充沛与复杂。作家将真挚而丰富的情感、清晰而显著的主体意识浓缩其中,使得这部作品卓尔不群、熠熠生辉。

一、“文革”历史的族群记忆与“知青文学”

对于“十七年”和“文革”历史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伤痕文学”使人们不得不正视“文革”给个体带来的酸楚,特别是精神上的“内伤”。然而此类作品仅止于一种“揭伤疤”的冲动,急于将一己愤懑之情抒发而出,社会政治因素过浓。“反思文学”则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造成十年“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剖析,落脚点延伸到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以及社会变革与出路的思索当中,与“改革文学”并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广泛接触西学之后,开始将反思引入另一维度——“文化热”迅速兴起,改造国民性问题也在这一文化大潮

中被再次提了出来。作家们试图以文化为途径来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诉求接轨,以文化的现代化为途径来完成社会政治的“四个现代化”。以此为契机,“寻根文学”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创作潮流。与此同时,“知青文学”也以其独特的风貌而引人侧目,“知青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其意义逐渐彰显出来。

在20世纪80年代,“知青作家”对“知青”生活的记忆与反思是普遍的和一贯的,然而在叙事模式和感情倾向上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条河流。大部分作家未脱“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窠臼,笔下的历史记忆仍未脱离所谓的“真实性”,其批判与反思的维度依然集中在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他们描绘“知青”在农村的凄凉遭遇,描绘落后农村与城市文明的格格不入,描绘他们在火热时代中的孤独、彷徨和无助;他们描绘“文革”中“极左”路线对“知青”的迫害,描绘他们所遭受的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苦难;他们描述“知青”返城后的种种遭遇,表达对当下平庸生活的无奈与不满。概言之,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暴露“文革”的黑暗、反思“文革”的教训、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成为他们作品表达的主要内容。竹林的《生活的路》、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创作模式的代表。另外一些作家则摆脱了个人情绪上的偏激,以较为冷静的目光审视那段历史,将“文革”记忆转化成一种审美资源,将理想主义色彩浸于其中。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将曾经的苦难转化成一种诗意的审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将一种博大的牺牲的

收稿日期:2012-07-26

作者简介:翟传鹏(1983—),男,山东鱼台人,西安邮电大学数字艺术学院讲师,博士。

爱与一种苦难中坚守信仰的理想主义演绎到极致。前一类作品如今已鲜有人问津,而后一类作品在经历了时间的大浪淘沙之后,仍然熠熠生辉,显示出长久的生命力与独特的魅力。

王小波却在这两条河流之外,以充满解构的语言和叙事开启了另一新航道。王小波也曾不遗余力地批判“文革”对人性的压抑、对知识分子的戕害,揭露“文革”给国家、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是与其他作家作品所共通的。不同的是,他用一种戏谑的语言与口吻来描绘“文革”,充满了反讽与揶揄色彩。比如“革命时期的痔疮”(《革命时代的爱情》),将革命的宏大叙事消解成世俗世界里最不堪言说的形而下之事,使得革命的崇高感与悲壮感荡然无存。再如李先生“龟头血肿”名号的由来(《似水流年》),将“文革”大字报和派别之间的争斗及其给人带来的伤害用一个充满戏谑感的词语表达出来,将权力斗争转化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生殖器之间的斗争,严肃的意义被拆解得支离破碎,讽刺之意随之彰显。因而王小波笔下的历史记忆虽与前辈或同辈作家笔下的种族记忆取材一致,但在材料处理与情感基调上,却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王小波的作品不似伤痕文学那样,如同一匹受伤的老狼,时不时地舔舐自己的伤口;亦不像反思文学那样,在宏大的话语体系中,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寻找普遍的意义与真理;也不像“文化寻根”派所追求的那样,在古老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中实现现实社会的理想诉求;他的作品始终以一种后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以一种游戏与戏仿的态度来玩弄和解构历史;他的作品试图在历史的罅隙中寻找诗意的生存空间,尽可能地复原生命本原与本能欲望,最大限度地完成对个性价值与自由思想的召唤与重建。

二、“革命时代”与“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股“怀旧”(nostalgia)之风弥漫于全社会,进入21世纪后,这股风则愈演愈烈。且不说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2046》中近似黑白片老电影般的怀旧感,单从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张元的《看上去很美》,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血色浪漫》,从《甜蜜蜜》到《大工匠》而观,这些对已逝的革命和激情时代的回忆与怀旧之作,在当下影坛已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影片中,历史的记忆已经变得暧昧与模糊,成为一种溶液,稀释于水中,革命时代变成了一个资源性的背景。“现代派在缅怀过

去的时候经常是充满痛苦的”^{[1]457},而当下的怀旧已经“不能再正面地体察到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历史关系,不能再具体地经验历史(特征)了”^{[1]462}。因此,当下的怀旧多多少少带有一种后现代色彩,它不再将已逝的时光看成生命无法挽救的哀歌,崇高意义与深沉感被零散化和平面化所取代,历史更多地演化成为一种资源性的碎片,消融于现实的娱乐与消费当中。

当昔日“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步入知天命之年或花甲之年时,曾经伤害过他们的年代已渐行渐远,以往的苦涩青春经过时光的洗礼后,变成了异样的花样年华,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如同泛黄的老照片一样弥足珍贵,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使他们更加怀念已逝的、虽单薄孤寂却又充满浪漫激情的黄金岁月,种种原因的契合,使他们对历史多了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美好追忆,而少了一份卢梭式的自我批判与剖析。当下的青年,不满于这个平面化的浑浑噩噩的时代,他们渴望激情与梦想的交织与碰撞,幻想金戈铁马式的刚健生活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燃烧岁月,他们之于那段历史,多了一点好奇、好玩与探索之心,少了一种伦理道德评判之意。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曾经为一批老作家悲痛欲绝、怒不可遏的悲惨世界,在无形中被转义成一种理想主义的实验场、一片热血与激情的实验田。“‘过去’变为一大堆形象的无端拼贴”,“先是逐步被冠以括弧,然后整体地被文字、映像所撤销、抹去。留下来的,除了‘文本’之外,真的一无所有了。”^{[1]456}

王小波《黄金时代》的诸篇作品产生年代要稍早于这股怀旧之风盛行之时。不同于这后起的怀旧之风之于历史的暧昧与模糊,王小波的这些作品中对历史充满明朗却又复杂的态度。

王小波对“文革”惨痛历史的反思与抨击是一贯的。他抨击那个时代的无理性,“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2];他抨击那个时代对人性的压抑,“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3]。这种抨击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亦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只不过,王小波以一种诗意的笔触重新结构了以往的历史,使历史既不显得悲壮亦不显得惨烈,而是充满荒诞之感与游戏之情。

以“斗争”李先生为例,斗争会开成了“打包大赛”^[4]。在作者的描绘中,“条状”、“阿米巴状”、“椭圆状”的包消解了斗争的惨烈感和可能引发的

读者的生理痛感;李先生“伸着脖子、皱着眉”、“老僧入定”的模样消解了人物的悲剧性而平添了滑稽感;众人的“打包大赛”更像是武侠小说中论功夫排座次的“华山论剑”。这样的斗争场面为许多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所见,如果说以往的作品试图以惨烈的场景唤起受众内心的痛楚与怜悯之情,以达到教育和警醒民众的目的的话,王小波则是以一种狂欢化场景的描绘,令人在捧腹大笑之余感受到淡淡的哀伤。

王小波笔下的“文革”历史又成为个人的一己“私史”。从个体经验的角度书写历史也是“文革”历史叙事的一个传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而得以复返之后,作家急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文本中往往夹杂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个体体验色彩。作家的影子一旦藏于其中,就使文本在“讲真话”的同时,刻意追求着一种悲壮、宏伟与崇高,主人公或抒情主体往往被塑造成一个个挺拔、光辉和伟岸的形象,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神话”色彩。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诸多作品也或多或少有着作家自身的影子。所不同的是,王小波的作品很少植根于一己痛入骨髓的感情,囿于个人的感情漩涡中不能自拔,而是将这种感情普适化,在更广阔的人性视域内探讨人的生存问题,并将其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将这种“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转化为普世人性的和风细雨,祛除了悲痛,留下了轻松;祛除了崇高,留下了诗意,使得一个可悲、可怕、可怜、可恨的时代转变成平平淡淡的似水流年。

王小波笔下的人物是一类边缘化的人物,他们始终与那个时代保持着貌合神离的关系。这种“边缘化”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罗亭》)和夏目漱石笔下的苦沙弥(《我是猫》)等作品中“多余人”的形象。这些“多余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却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耽于每日的幻想而又缺乏行动的勇气,生活平庸、空虚和无聊。而王小波笔下的人物与上述的那些“多余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对政治、对革命没有过多的热情,他们是在火热的时代中保持正常幽默和诗意生活的一批人,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罅隙中保持着童趣和生命本性的一批人,这样的人不是用冷眼看世界,对一切充满悲观绝望,而是以诗性的目光审视社会与时代,将一切的喧哗与骚动视作一部部荒诞不经的漫画或电影。这样的人物少了酸腐之气和平庸之感,多了一种生命的乐趣与生存的荒诞感。

正是这种历史场景的设置与人物的刻画,使得

《黄金时代》中的诸作品充满了内在的斑杂与悖反。一方面,作者不遗余力地批判那个时代,诸如刘先生因吃鸭子不得而死的荒诞而又荒凉的故事比比皆是。作者用戏谑的笔触写出了—个时代的混乱与无理,并在其中凭吊自己的青春,“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然而同时,作者也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5]这样,往事在经历年华的洗涤之后,剩下的更多是一种审美性的记忆,一个青涩、清纯而又可爱的黄金时代:“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6]因此,这样一个时代对于王小波而言,意义繁复而又多样,诚如论者所言:“各种声音彼此交汇、挤撞,但某种善、某种正义之音仍然依稀可辨。”^[7]

三、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

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以一种童年视角来结构历史,用一种陌生化的手法来书写历史,这使得他笔下的“文革”史新奇、陌生、引人入胜,而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也成为《黄金时代》中最富有生命力与吸引力的地方。

儿童视角不像第三人称视角那样全知全能,亦不像第一人称视角那样充满个体体验色彩,这种限制视角使叙事不那么一马平川,而是充满节制感,从而避免了泥沙俱下;使感情宣泄不那么酣畅淋漓,而是节制有度,从而避免了恣意汪洋。小说以“王二”的童年视角来描绘的历史,充满了新奇与好玩之感,例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对大炼钢铁情景的描述就是显著一例:

我和好多人一起涌到一个怪房子前面,别人用长枪在墙上扎了一个窟窿,从里面挑出一团通红的怪东西来,那东西的模样有几分像萨其玛,又有几分像牛粪,离它老远,就觉得脸上发烫,所有的人围着它欣喜若狂——这情景很像一种原始的祭典^[8]112。

炼出来的钢铁既像萨其玛又像牛粪,少年“王二”将“大炼钢铁”时的怪异现象与自己周边常见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三种截然不同的物象在视觉效果上竟然出奇的一致。这种新奇的比喻,“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9]。萨其玛和牛粪在视觉效果上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在味觉效果上则截然相反,同冷

冰冰的钢铁给人的感官效果差距更大,因此,这样的比喻在感觉上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滑稽的比喻亦使这一历史场景凸显出荒诞的一面。作者以儿童视角来观照这一切,“怪东西”、“觉得脸上发烫”等这种只有儿童才具有的新奇感觉,很好地参与了场景的构成与描绘,使得一切都保持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般的朦胧,荒诞的历史在这种充满智慧与游戏的戏仿中消解殆尽。王小波以其充满童趣的叙述,解构了历史的严肃意义,增加了诗意的想像空间,而这也正是其文本引人入胜的地方所在。

“陌生化”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什克洛夫斯基曾有感于日常语言的平庸、呆板和缺乏活力,试图通过“陌生化”来实现文学语言的清新性、奇异性与生动性。“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9]。“陌生化”将大家十分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化腐朽为神奇,使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与鲜明,从而挣脱生活的蒙蔽,体验艺术的超凡脱俗,恢复对生活的新奇感受,亲历审美过程的美好与珍贵。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诸作品典型地实践了这一创作手法,作者惯用新奇的比喻、充满意趣的想像来描绘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并使之呈现出别样的意蕴:

我对它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臭。四季有四季的臭法,春天是一种新生的、朝气蓬勃、辛辣的臭味,势不可挡。夏天又骚又臭,非常的杀眼睛,鼻子的感觉退到第二位。秋天臭味肃杀,有如坚冰,顺风臭出十里。冬天臭味黏稠,有如糨糊。这些臭味是一种透明的流体,弥漫在整个工厂里^{[8]261}。

王小波对于豆腐厂厕所臭味的描绘更是画虎画骨、入木三分。作者另辟蹊径,将自己对于臭味的感觉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描绘出来,语言新奇生动、意态横生。这样一种嗅觉感受与“透明的流体”的视觉感受、“杀眼睛”的触觉感受结合在一起,显得饱满而圆润;四种截然不同的臭味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顺风臭出十里”等夸张手法的运

用,戏谑色彩浓郁。引文形象跳跃起伏而感情契合严谨,将一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描写得煞有介事,从而显得滑稽可笑,充满着浓郁的喜剧气氛。

王小波的这种“陌生化”描绘与“戏仿”手法异曲同工。“戏仿”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在当下有着巨大的生长空间,有论者将其认定为“犬儒主义”的修辞方式之一,而“犬儒主义是大众文化赢得市场的一个重要策略”^[10]。但应该看到,《黄金时代》的“陌生化”手法运用的背后,有其十分严肃的寓意,这种寓意是需要深入思考和仔细琢磨的,“戏仿”的背后自有其深刻思想。因此,王小波的文本从来不缺乏阐释空间,它是“小众”的,而非大众化的,它不像犬儒主义者那样是媚俗的,时刻以大众的需求为依归,而是笔立在山头,以生命体验和语言实验为两个维度,将对生命与自由的思考、追求与渴望圆满地表达出来。

四、结论

1. 对“文革”历史的书写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深厚的传统与渊源。与其他文本所不同的是,《黄金时代》始终以一种审美性的眼光来结构历史,将“文革”记忆以诗意的语言描绘出来,使历史记忆多了一份诗意与美感、少了一份壮烈与凄惨。作者并非对那段历史缺乏批判意识,而是将这种严肃的批判意识以反讽与戏谑的手法表达出来,从而在事实上解构了历史的严肃性与经验的惨痛性,徒留荒诞与怪感。

2. 在《黄金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作家的心境也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作者对“革命时代”的荒诞不经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嘲弄与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又将自己对“黄金时代”的青春和生命的凭吊与怀念以及理想丧失后的失落感蕴于文本之中,从而使其五彩斑斓、细腻而丰富。

3. 在《黄金时代》的文本建构中,王小波运用了“陌生化”手法,以一充满童趣的视角看待荒诞的历史和人生,从而使“文革”记忆展现出别样色彩,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趣味性。

参考文献:

- [1] 詹明信.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 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 陈清侨,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2] 王小波. 知识分子的不幸[M]//王小波全集(卷1).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28.
- [3] 王小波.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M]//王小波全集(卷2).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63.

[4] 王小波. 似水流年[M]//王小波全集(卷6).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107.

[5] 王小波. 人性的逆转[M]//王小波全集(卷1).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112.

[6] 王小波. 黄金时代[M]//王小波全集(卷6).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6.

[7] 姚新勇. “黄金时代”的重写与敞开——王小波的写作与现代新理性的重建[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5(2): 116-120.

[8] 王小波. 革命时期的爱情[M]//王小波全集(卷6).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9] 什克洛夫斯基. 作为手法的艺术[M]//什克洛夫斯基.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方珊,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6.

[10] 叶奕翔. 大众文化的叙事策略[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1(3): 74-78.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Golden Age*

ZHAI Chuan-peng^{1,2}

(1. School of Digital Media Arts,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Xi'an 710121, China;
2. College of News and Medi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Golden Age* uses an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to structure the history. The mem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poetic language, making the historical memory full of the sense of beauty and poetry instead of the sense of being heroic and tragic. The author has a complex attitude to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is mixed with criticism and idealism. *Golden Age* structures the history in children’s perspective, which typically practices the idea of “Defamiliarization” and makes the novels much funny.

Key words: Wang Xiaobo; *Golden Age*; historical narrative; defamiliarization

(责任编辑 李世红)